

生路與末路



生 路 与 末 路

戈烈夫等著

群 众 出 版 社

1959 年 11 月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通过一些真实的事件，反映了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政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面前，所走的不同道路和他们所得到的不同后果。全书共有二十篇，从这些活生生的实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反革命分子在巩固的人民政权和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广大群众面前，只有坦白自守才有光明的前途，如果执迷不悟，继续与人民为敌，则只有死路一条。

群 众 出 版 社

(北京东长安街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总)12(文)10开本787×1092¹/₃₂印张2¹¹/₁₆

1957年5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3次印刷

字数59千字 印数28001—53,000册

统一书号：10067·10

定价：(6) 0.23元

目 录

棄暗投明.....	(1)
开始了新的生活.....	(8)
悬崖勒馬.....	(11)
消除了顾虑.....	(14)
将功折罪.....	(17)
他放下了千斤重担.....	(20)
潜伏还是投案.....	(26)
最后的选择.....	(29)
他终于清醒了.....	(34)
回家之后.....	(41)
我是来坦白自首的.....	(45)
生路.....	(50)
回头是岸.....	(54)
在事实面前.....	(58)
走上新路.....	(63)
生路与末路.....	(66)
掩盖不了的事实.....	(71)
逃不掉.....	(74)
斩断罪恶的魔爪.....	(78)
可耻的下場.....	(81)

弃暗投明

晨 光

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委员会第二组”派遣潜回大陆活动的“上海区特派员”张毅在1956年2月16日向杭州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

这年春节前几天，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给港、澳同胞回乡过春节以各种便利的消息在香港传开了，很多人忙着整理行装，张毅也拿了一张“港澳居民春节回乡证”夹在香港回乡的居民中，混进大陆来了。

2月9日，张毅在广州搭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张毅在车厢里看到旅客们都在愉快热情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就回想起自己在港、澳时表现的那种恐惧，真是可笑已极，也后悔没有把电台随身带来。他在火车上开始寻找目标。当他发现有二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正在谈论军队里的生活情形的时候，便凑了过去，企图弄点军事情报。他刚刚靠近一点，其中一个战士很注意地望了他一眼，就向另一个战士说：“咱们不谈这些了。”张毅并未因此就打消了搜集情报的企图。他又继续寻找新的目标。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工人，正在和两位同伴谈着自己将从上海搬到东北去的事。张毅便装出一副“见面熟”的样子，钻进谈话的圈子里去，而且直接对着那个青年工人问起话来：

“你是到东北去么？”

“是的。”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没有得到回答。

“你为什么要去东北呢？”

这个青年工人冷冰冰地说：“为什么？为工作！”以下再也不说什么了。

经过这两次试探之后，张毅的内心又开始紧张起来。觉得在这样的人当中活动太危险了。他找了一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落蜷伏起来，盘算下一步的计划。

除夕这一天，火车到达了杭州。张毅匆匆忙忙地从车上下来，跑到冯山人巷四号史文霞的家里。

史文霞是张毅过去很要好的朋友；她的丈夫史桐生也是张毅的朋友，过去在蒋军里做事，现在还在台湾。张毅想利用和史文霞的旧关系以及史文霞的许多弱点，要她把自己掩护起来，以便进行活动。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如意。在家里的主人却是史文霞的小姑史静霞。这个小姑见着他就把脸沉下来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史静霞带着怀疑的眼睛和紧绷绷的面孔，表示出她不欢迎这个来路不明的不速之客。张毅只好支支吾吾地说：

“姐姐，我从香港来，特地来看你们的。”

“我们生活得很好，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我知道。不过，姐姐！你看我穿着这套香港的‘唐装’（中式衣服），实在太冷，又很特殊，怪不自在的，姐姐可不可以陪我去买一套棉衣服？”

可是，这位“姐姐”却望着大门外回答说：“买衣服可要布票呀！我们的布票只够自己用。”

这样，张毅只好无可奈何地转过话题，向她探问史文霞的情况。史静霞一连串不耐烦的回答，使张毅不能再问下去了。

这时候，史文霞的女儿史蒂华恰巧伏在桌上写信，張毅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下角写着“嘉兴市第二医院”的信封。从笔迹判断，这很可能是史文霞的来信。为了証实这点，張毅就对史静霞說：“姐姐！把那封文霞来的信給我看吧！”

“文霞来的信用不着你看。”

不管史静霞的态度怎样冷淡，这句话却給他証明了史文霞的下落。但是天气这样冷，沒有棉衣，沒有住处，怎么办？这时候，他突然想到史文霞的弟弟史迪群，这个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作过事，找到他或許会有些办法。張毅就挨近戴着紅領巾的史蒂华說：“陪我上舅舅家去，好吗？”

史蒂华也冷冰冰地說：“我不高兴！”

張毅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支派克鋼笔，放在她面前說：“蒂华！我从香港来沒帶什么礼物，就把这支派克鋼笔送給你吧！”

小姑娘說：“我自己有！”

他連忙說：“那么我們調換过来用，作个紀念吧！”蒂华也不換。他又順手拿出一盒餅干，对蒂华說：“餅干！留給你吃吧！”小姑娘看也不看，就回答：“我不要吃。”

張毅碰了一連串的釘子，窘得臉也紅了。他正覺得非常尷尬的时候，史静霞走过来对他說：“你要是真的关心蒂华的話，請你看一看2月1日的浙江日报，周总理的报告上講：現在台湾願意回大陆的人，可以回来了，过去犯过罪的，可以寬大他們，还可以給他們工作做。如果你知道蒂华爸爸在台湾的地址，告訴我們，也好写信把他叫回来，共产党是怎样說就怎样做的。”

史静霞的話，象釘子一样釘在这个老特务的心上。張毅慌亂得只能支支吾吾地說：“蒂华爸爸在台湾，我在香港，

他的情况我不大曉得。依我看，这种信最好还是不要写吧！……唔！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張毅狼狽地从史家走了出来。街上正是家家張灯結采，欢度除夕的时候。他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夾衣，紧縮着脖子在零下五度的严寒里走过街市，抱着最后的一点幻想，搭車往嘉兴去了。

張毅跑进嘉兴第二医院的时候，史文霞正在值班。她对張毅的突然来临感到十分奇怪，不等張毅張口就对他說：“你最好同我們組織上談談去！”說着，就跑去报告了医院的負責人。

史文霞的这个行动，对張毅是最沉重的当头棒。他在台湾訂下的全部計劃，到这里完全破产了。他不能不开始焦急地考虑起他的命运来。但意外的是，医院的院長却亲自来找他，亲切地招待他吃飯，而且还留他住下。这使張毅更加惶恐了。

旧历大年初一，張毅覺得史文霞对他的态度，比昨天剛見面的时候和緩了一些，給他买了棉衣，还領着他各处去逛一逛，并且向他介紹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种种新事物。在談話中，史文霞問到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經在上海一个国民党机关里做事的事，他沉默了半晌，覺得实在不能隱瞞了，就支吾地說：“在‘中統局’做过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一直做生意，为生活奔波到現在。参加‘中統’的事，在解放时已經向上海軍管会交代了。”史文霞馬上警告他說：“你不想想自己过去为誰服务，为誰出力，而現在，解放六、七年了，你还說这种話！”

晚上，史文霞又帶着張毅去看电影“天罗地網”。当銀幕上出現一个“紅領巾”的时候，張毅就联想起史蒂华和自

己現在的处境。突然电影里那个“七号”特务被捕了，他心里不禁也“卜通”地一跳，緊張地吐了一口粗气。

看完这场电影以后張毅的心緒很乱，很緊張。他想，無論如何是潛伏不下去了，今天不被抓起来，明天也要被抓起来。跑又跑不了，藏也藏不住。他想学电影里的那个“交通”，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他走进了屋子，心神不定地望着史文霞，史文霞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說坦率些，我不信任你。”

“那怎么办呢？”

史文霞堅定地說：“政府相信你，我才会相信你。”

这使他再也不敢吭声了。

2月14日，史文霞回杭州去看女儿，張毅在嘉兴沒有安身的地方，不得不跟着史文霞一同到杭州去。

当天晚上，史文霞拿着2月1日的“浙江日报”到張毅跟前，把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詳細地讀給他听，特别是把对台湾蔣介石集團軍政人員的政策那一段，反复地讀了几遍。史文霞又告訴他：“張毅！解放以后，我和我的女儿过着安定美滿的生活，这个你亲眼看到了。而你和你的妻子儿女呢？几年来一直在外地东跑西奔，担惊受怕的，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自己是亲身体驗到的。一个人一辈子就这样結束了嗎？你到底依靠誰呢？要是你这一次回到大陆来不是真心投靠祖国的話，你想想看，誰对你会放心呢？”

当时，張毅簡直不知道該怎样回答史文霞才好。但是有一点他很明白，就是史文霞說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已經到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严重的关口：是依靠美国和蔣介石呢，还是依靠祖国和人民呢？現在不能不有所選擇了。于是，他对史文霞說：“我懂得你說的一切，你放心好了。咱們的方向

能够一致的。”

这一夜，張毅一直沒有睡着覺。他回想着他过的这十几年来来的罪惡生活，回想着他潜回大陆以来的这几天的境况，回想着电影“天罗地網”中那个“七号”特务分子的下場，回想着史文霞对他的談話和念給他听的“政治报告”。他在心里翻来复去地默念着“政治报告”中和他关系最大的那几句：“……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將寬大对待，不究既往。……”

第二天，史文霞和她女儿帶着張毅一起去逛西湖。他們逛了解放后已經面目一新的中山公园，又同去瞻仰了經過整修的民族英雄岳飞的雄偉庙堂。然后他們沿着苏堤到了西山公园，这是解放后新建的大公园，这天游玩的人很多，个个都是那么愉快活潑。这一切，使張毅产生无穷的感慨。一路上，他默默无言，剛进门就向史文霞說：“時間不能再耽擱了，我要找地方投案去！”

張毅在杭州市公安局城站派出所，向所長报告了他是蔣介石特务机关“中央委员会第二組”派来的特务，同时交出罪証，交代了自己的反革命历史。原来張毅是在1937年就参加了蔣介石的中統特务組織，在“青浦訓練班”受过特务訓練，后来又在上海一帶进行过許多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罪惡活动。解放时逃到台湾，又参加了美国特务机关“西方企业公司”，受过訓練，1950年曾潜回大陆活动过，这次是蔣介石特务机关“中央委员会第二組”派遣潜回大陆活动的上海区“特派員”，他說：“現在感到靠美国、靠蔣介石靠不住了。只有投靠祖国才有出路。所以特来自首要求政府寬大处理。”

在4月23日召开的處理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的大會上，杭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當眾宣布了对張毅不予起訴的寬大處理，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根據張毅檢舉了重要特務分子，立了大功的表現，當場發給他物質獎勵。張毅本人在大會上表示決心老老實實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張毅現在已被分配到杭州師範學校圖書館工作。

开始了新的生活

陈 泰

1948年11月，对于郑介甫来说是个可怕的时间。从那时候起，他成了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先后在伪国防部二厅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保密局”受了收发无线电报的技术训练，干起颠覆祖国、危害人民的勾当来。1949年11月，他被“保密局”派到舟山，担任“保密局定海站”的报务员，以后还在沿海岛屿上活动过。

1950年，“保密局宁波潜伏组”组长纪文达看中了他，带着他到台湾，领了电台、经费，又回到宁波，潜伏下来。两个人以叔侄相称，纪文达以开店作掩护，郑介甫则编造了一套动听的历史，考入宁波私立崇实商校，又以此为跳板，打入宁波财经干校。但是，正当他们庆幸第一步潜伏计划实现的时候，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暴露着的反革命分子被揭发，被逮捕法办。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郑介甫，这时也不免心慌意乱起来，他去找纪文达。

“怎么办？”

“好容易进来了，你慌什么？”

“可是，我没有户口，又要鉴定，还有……”

“够了，够了！你去坦白？去挨枪毙？”

郑介甫一听到“枪毙”，面色苍白了。多少个夜晚他不能入睡，盘算着应付的办法。他不敢看别人一眼，不敢和人接近。整天躲在图书馆、新华书店里。

学校这一关总算被郑介甫混过去了。他被分配到宁波市修建委员会工作。人人都在为建设祖国而热情地劳动着，而

他，就是想也不敢想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他尽量找工作做，不使自己有时间去想，不使别人看出破绽来。

有些人被郑介甫的工作表现迷惑了，觉得这个年轻小伙子不错，工作起来挺有劲，就是政治上不开展。青年团支部也在关心和注意他。可是他看到团员过来，就远远的避开。人们和他谈入团问题，他就借口工作忙来岔开。因为他探听到：要入团就得接受审查，这样，他就会露出马脚来的。

1953年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公布震动了郑介甫。这时，朝鲜战争的火焰被扑灭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更渺茫了。他翻开报纸，看到的不是这里建设，就是那里人民的生活又得到改善。就象长兴这样的一个小城——郑介甫新调到这里来工作——也在兴建工厂，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到处都可以看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郑介甫更苦闷了。他觉得：无论什么人都有前途，就是自己没有前途；人家走的都是光明大道，只有自己陷在无边的苦海中！别的工作人员回家休假去了，他在上海也有家，也有母亲和姐姐，但是不敢回去，就是往家写信寄信，也是偷偷地，怕被别人看见了引起怀疑。自己还年轻，实足年龄才20岁，往后这种见不得人、痛苦的生活怎么过？隐瞒呢还是坦白？他在苦惱着，工作上的差错也多起来了。别人喊叫他的名字，他会立即一怔，马上立正，回答一声：“有！”领导干部来了，他也马上起立。他一天天地孤独起来了，可是周围的人都这样热情，真象个大家庭；他感到温暖，他又苦闷，因为他是他们的敌人。人们还不觉察，而他却是心里明白的。

一次干部会上，郑介甫听了中共县委书记的报告，报告中所谈到的祖国美好的远景叩动着他的心弦。他决心努力争取重新做人，他想：就是坦白了，去劳动改造，也比这种瞞心

味己的日子好过。但是他又一想：“坦白了真的会宽大处理嗎？对特务也能宽大嗎？这里的人又这样看得起我郑介甫，坦白出这种見不得人的事，他們还相信我嗎？”他犹豫着，时时刻刻地在进行着思想斗争。

以后一段时期，郑介甫調到上海工作去了。上海，已不是郑介甫在1948年看到的上海了，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上海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可是郑介甫，却在和这条道路背道而驰，走向黑暗。他决定到离别了多年的家里去，一夸进門，鄰居就問：“找誰？哪里来的？”郑介甫轉身就走了。他怎么說呢，說是台湾来的嗎？說是特务来找母亲嗎？母亲会怎样对待他呢？他不只一次在里弄口徘徊，心里难过，又不好和誰說。过春节了，人們欢天喜地的，他还是在苦悶中。人家談起普选，他就心惊肉跳，怕被人发觉了自己的身份。人家一提到反革命分子、特务，他又以为是在說他。他不断問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这条道路再走下去，永远不会再有出头的日子了。他想了很多的日子，决定了：“向政府坦白，爭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

郑介甫向政府把自己的反革命历史作了彻底交代，并且檢举了同案的特务分子，使公安部門順利地破获了特务案，繳获了电台。于是郑介甫得到了宽大处理。在3月22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对他免于刑事处分。他走出法庭，回到浙江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領导上又宣布他仍旧担任财务科的办事員。

从此，他开始了新人的生活。

悬崖勒马

柳 秀

郑国强现在上海市某工厂当学徒。1953年年底，他还在香港。当时他所工作的某眼镜公司歇业后，拿到了200元港币的解散费，就想回上海来。但在向香港当局提出申请来沪期间，解散费用完了，一个国民党特务问他：

“你回上海去，有路费吗？”

“路费用完了。”

“不要紧的，”那个特务说：“我给你想办法。”

于是郑国强被骗参加了蒋匪“中委会”的特务组织，并受了短期的个别训练。然后让他来沪，叫他搜集新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这样，郑国强就在1954年春天，搭火车回大陆来了。

到了广州，郑国强住在旅馆里，心想自己13岁到香港去的，对祖国印象不深，听特务组织里的人说，现在大陆上共产党怎样怎样，但不知是真是假……

他正想着，忽然看见几个解放军战士进旅馆来了。他们给他的印象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他们自己带行李，自己倒茶、盛饭，对工友和颜悦色。

隔天，郑国强又搭火车从广州来上海，一路上看见祖国的建设面貌，就觉出他在香港所听说的全不是那么回事。火车到了钱江大桥旁边，他想大家该下车了，因为他以前从上海到广州去，路过这里，大家是要下车走路的。他这一个料想也错了，钱江大桥早修建好了。火车一直驶过了钱江大桥。

他回到上海以后，整天躲在家里愁眉苦脸的，饭也吃不

下去。母亲見他这样，还以为是他失了业的緣故，却不知道他有很大的心事。他看見报上的鎮压反革命的报导，总是心惊肉跳。有一次，他看到里弄大字报上写着：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因为罪惡严重，还抗拒到底，因此受到了严惩。使得他在夢中都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有一天，香港来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他在特务組織里所用的一个化名。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的鄰居把信交給他，他却讓他母亲把信拿上楼去。他上了楼把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个特务催他写情报的信。他抖着双手，赶紧把信燒了。“去向政府坦白吧？”他想，“政府的政策不是坦白从寬、抗拒从严嗎？”

可是他又怀疑坦白后是否真能从寬处理。

这样，他又拖延下来了。

后来他向区失救会提出要求劳动就业，失救会干部对他說：

“你要就业是可以登記的。你將自己过去的情况、干什么职业談一下吧！”

他在失救会談話后回到家里，吃飯时，对着桌上的飯碗直发呆。他母亲見他平时还能吃半碗飯，今天連半碗飯的一半也吃不下了，就問：

“国强哪，你心里倒是有什么事呀？”

郑国强心里一酸，把肚里的疙瘩全部說了出來。他母亲一听，連忙叫三楼的赵同志来商量，赵同志告訴他說：“只要你彻底坦白，一定能够得到人民政府的寬大处理。”

第二天一早，郑国强终于把参加特务組織的情况，向公安机关作了彻底的交代。公安机关对投案自首分子是抱着誠懇的欢迎态度的，当即根据郑国强的真誠坦白、彻底交代的

情况，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予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分。后来香港特务机关又来了一封信，他就把这信立刻送给了公安机关。

此后他饭也吃得下去了，话也多起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放不下，他想：自己做过特务，虽然得到宽大处理，但哪个单位会要自己去做工呢？同时，他天天看报，见国家建设一日千里，许多青年都当上了劳动模范，而他自己却整日闲在家里，他觉得个人前途还是很渺茫的。

但是，事实并不象郑国强所想象的那样，他获得了工作的机会。他觉得自己的心亮了起来。

“过去，国民党特务把我推到反革命的泥坑里，叫我来破坏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共产党把我从泥坑里救了出来，叫我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劳动，坚决和反革命切断联系，坚决和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这就是现在在一个大型的机器厂工作的郑国强所说的话。